



人生没有固定的轨道

蒋经韬

写这篇创作谈之时，我正在拉萨。刚从《文成公主》实景剧场走出来，海拔三千七百米的歌舞升平，与脑海中那个关于武汉创业者的故事，在这一刻构成了奇妙的互文。一个是奉命于危难之际的亲使者；一个是主动拥抱时代变局的创业者——她们讲述着同一个命题：一个人，要如何走向未知的远方。

杨涵涵无法与文成公主同日而语，但她们的精神内核，有着惊人的共振：当生活将她们推向陌生的旷野，她们没有后退，而是选择成为那个“向前走”的人。

思绪从雪域高原回到江城武汉。我想起有一次微信通话补充采访，她当时正在机场准备出差。我在电话里问她：“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沿着一条轨道走过来的吗？”

她沉默了两秒，认真答道：“蒋老师，我从来不相信人生是一条固定的轨道。轨道是别人铺好的，我只能沿着走，不能偏，不能停。但我的人生不是那样的，我的人生是一片旷野——没有路，所以哪里都可以是路。辞职照顾母亲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；去做电商卖热干面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AI会在前面等着我。我只知道，旷野上没有栏杆，你想往哪儿走，就往哪儿走。走错了，换一个方向就是了。”

这段话，我听了好几遍。生活把人逼到墙角，她翻墙出去了，发现墙那边没有轨道，只有无垠的旷野。于是她开始奔跑。旷野上没有红绿灯，没有斑马线，但有风，有光，有无数种可能性。她说她在探测AI的边界，其实她也在探测旷野的边界——一个学音乐的能跑多远？一个当过副院长的人能跑进菜市场吗？一个搞电商的人能跑进AI的星辰大海吗？边界在哪里，她不知道。她只是不停地在旷野上奔跑。

有人说，AI是时代的鼓点。也有人说，人生最好是按部就班的轨道。但在杨涵涵身上，我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景：人生从来不是固定的轨道，而是无垠的旷野。文成公主在一千三百年前走进了那片旷野，杨涵涵在今天走进了类似的一片旷野。她们之间相隔千年，却共享同一种精神底色。

旷野上没有路，但正因如此，每一步都是新的路。祝福杨涵涵，继续在这片无垠的旷野上奔跑。插上AI的翅膀，飞向她心中的那座圣山。

蒋经韬：高级记者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历任荆州电视台副台长，荆州日报社社长，湖北长江商报社长。先后创作和主编新闻、文学作品近百万字。出版散文集《花之语》《春天的故事》《生命长河一滴水》等。

2026年初春，一部由四人团队、耗时数天、算力成本仅3000元的AI短剧《霍去病》，突然如黑马般席卷全网，冲上热搜。千万网友为那个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”的少年英雄热血沸腾，更惊叹于其磅礴的战争场面与细腻的情感刻画。没人能想到，这部作品的“总导演”，前几个月还在直播间里扯着嗓子卖武汉热干面。从音乐学院到哲学硕士，从高校副院长到电商主播，再到AI影视的弄潮儿，杨涵涵的人生，就是一场永不停歇的“跨界”。支撑她一路狂飙的，正是湖北人骨子里那股“不服周”的倔强，以及一句她信奉了十三年的哲学箴言。

四月的武汉，春天来得不疾不徐。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的大礼堂门口，学生们三三两两往里涌，有人手里攥着笔记本，有人举着手机，屏幕上还闪烁着#AI霍去病封神之作#的热搜话题。今天来的这位，正是那个让霍去病在数字世界里“复活”的导演——杨涵涵。

上午十点半，礼堂里已经座无虚席。杨涵涵从侧幕走出来，军绿色的工装上衣，袖子卷到小臂，露出一截细瘦却有力的手腕。但最惹眼的不是那身利落的打扮，而是她的眼睛——那不是客客气气的柔和，是探照灯似的，直直地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人群，仿佛在说：别信命，信自己。

“我始终相信，任何一个领域，只要花10000个小时去研究，就能成为专家。”随后讲到《霍去病》时，她放了一段片花。大漠孤烟，千军万马，少年将军的眼眸有星辰，也有悲悯。三分种的片花放完，礼堂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香樟树叶沙沙的声音，有人默默红了眼眶。

“我们团队四个人，用四天时间，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，算力成本仅三千块钱。”她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空气里，“这就是AI时代——让一个没有任何影视科班背景的人，也能当导演。”

互动环节，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起身问道：“杨导，你跨界那么多次，究竟在追寻什么？”

她看着他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笑了。那笑容里没有鸡汤，只有从泥泞里站起来、拍打干净之后，浑身透出的坦荡：“既有骨子里‘不服周’的劲儿，也有现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。但说到底，是不认命。”

琴房里的“叛逆者”：两次考研，十个月不上微信换来389分

时间倒回十三年前。2013年的夏天，广州热得像蒸笼。星海音乐学院的琴房里，杨涵涵把拉了十五年的小提琴放进琴盒，轻轻合上盖子。琴盒边角磨得发白，像一段即将封存青春。

她三岁开始拉琴，一路拉到这所华南顶尖的音乐学院。老师说她是“小镇演奏家”，同学说她有天赋。可她心里清楚，在纯粹演奏这个维度上，她已经看见了自己的天花板。不是拉得不好，而是太乖了——她能精准地复刻巴赫和帕格尼尼，却复刻不了内心的种种躁动。

那年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看不懂的决定：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。

“你疯了吧？”室友的眼睛瞪得像铜铃，“你一个拉小提琴的，去跟那些学了四年的科班生抢饭碗？”

她没解释。备考的日子是灰色的。十个月，她每天泡在图书馆里，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。她的底子薄，英语四级都是勉强过的，那些晦涩的传播学理论更是看得头昏脑涨。但在复习政治时，有一句话，像钉子一样扎进了她的脑子里——“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”。是马克思说的。那行字猛地劈开了她脑子里某个一直关着的房间。人生不是五线谱，没有那么小节线和终止符。

可是理想很丰满，分数很骨感。2014年春天，成绩出来：285分。复旦的复试线是345分。差了整整60分。她盯着电脑屏幕，半天没动。图书馆外面的樟树被风吹得沙沙响，她坐在台阶上把成绩单看了三遍，然后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

没哭。她不是那种会哭的人。

第二年，她换了个方向，报考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。这一次，她跟自己来了一场“极限挑战”。她把自己关进了“笼子”里：十个月，彻底不上微信。不是不上，是真的把社交软件全删了，手机里只留电话和短信。她租了一间朝北的小房子，暖气片半温不热，冬天冷得像冰窖。她把暖气片勉强有点热气的地方当成“宝座”，裹着毯子坐在那里背书，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。脚冻麻了就站起来跺两下，继续背。

那十个月里，她没逛过一次街，没看过一场电影，没跟朋友吃过一顿饭。有时候背到深夜，困得不行，她就站起来拉一会儿角落里那把落灰的小提琴。深夜的琴声在逼仄的小房间里回荡，像某种古老的仪式——提醒她自己是誰，从哪里来，以及，要往哪里去。

一年后，成绩出来：389分。高出国家线60分。她没有狂喜，没有眼泪，甚至没有笑。她只是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像跑完一场马拉松的人，终于可以停下来喝口水了。可命运这东西，最喜欢在人以为要上岸时，猝不及防地开玩笑。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她，居然在复试环节自作主张换了个专业方向——从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”换到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”。这个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决定，让她与武大失之交臂，最终被调剂到了重庆师范大学。

后来有人问她后悔吗？她说：“不后悔。每一次归零，都是一次重启。电脑重启好多次还要好几秒呢，人重启花个一年两年，不亏。”这话说得云淡风轻，但你知道，说这话的人，曾用十个月不上微信的代价，换来了对“自由”二字最沉甸甸的理解。

研二“赌约”：一万元押金撬动一家公司

重庆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到处都是葛蕨树，根须垂下来，像老人的胡须。在那里，杨涵涵遇到了导师樊伟。导师给她创业的建议，源于一个“祖传秘方”——一个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突出的方子，在杨涵涵家传了好几代。樊老师一家人都被这个病折磨，她拿方子给他们试试，居然治好了。

樊老师找她谈话，语气像是在下一盘大棋：“你这个好东西，为什么不把它做成产品？造福更多人。”她说：“我是个穷学生，没有资金，没有厂房，没有渠道。”樊老师说：“这些都可以解决。关键是——你想不想？”她想了两天，考虑到当时自己研究生一年级就修完了整个研究生阶段所有的学分，决定从研二开始，一边读书一边创业。她去找樊老师：“我想试试。”那股子“不服周”的劲儿又上来了。

创业的故事，最精彩的部分往往不是成功，而是怎么用最小的代价撬动最大的可能。杨涵涵把这事拆解成了三块：产品和技术是最难的，成本忽略不计；人工方面，她拉来了同宿舍的同学，同学又叫来了弟弟，她则叫来了自己的弟弟和叔叔，一个创业班子就搭起来了。大家约定“赚到钱就分红，没赚到就发底薪，互相托底”。最大的难题是场地。

是在重庆还是在武汉注册公司、办工厂？杨涵涵没有犹豫，直接选择了武汉江夏。她找到了一家三层楼的美容院，装修全新、设施齐全，却因经营不善即将倒闭。最棘手的是，老板的租约没到期，如果退租，要赔一大笔违约金。老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
杨涵涵脑子转得飞快。她没有选择常规的租铺方式，而是找到即将倒闭的美容院的老板，通过一连串大胆的商议，巧妙地接手了这家店。她没有多少资金，最终靠着诚意和一张清晰的商业蓝图，说服对方接受了她仅一万元的押



一场不停歇的“跨界”

蒋经韬



金方案，将装修完备的店面“借”给了她。这是一个看似四两拨千斤的操作，实则充满了风险与博弈。几轮艰难的谈判后，老板被她的诚意和那股“不服周”的劲儿所打动。她以这一万元为支点，撬动了自己第一家公司的诞生。

天时地利人和。公司第一个月就开始盈利。这不仅让她赚到了第一桶金，还获得了当年重庆市的创新创业一等奖。三年之后，全国加盟店发展到五十多家。但医药行业的门槛终究太高，五年后，她还是按下了暂停键。关掉公司那天，她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，窗外是重庆的万家灯火，像一地碎金。她没哭，只是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：“这条路走不通了，换一条呗。”

辞职信与告别：朋友去世与那趟没赶上的送别

2020年9月，杨涵涵应聘来到武汉工程科技学院。从学生工作处的普通职员，到后来担任学校乡村振兴学院副院长——副处级干部，稳定，有前途。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水，可她的心不平静。

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离开的，是一件小事，一件扎在心头很久的事。

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毫无征兆地意外去世了。消息传来时，她整个人蒙了，眼泪唰地掉下来。她第一反应是请假，回去送朋友最后一程。

但那时候，正值学校开学迎新，她所在的学生工作处忙得像打仗一样。看着同事们一个个脚不沾地，她张了张嘴，那句“我要请假”怎么也说不出口。她不愿把自己的工作压给别人，更不愿在所有人最忙的时候“掉链子”。

她没能回去。那几天，她白天照常上班，笑着迎接新生和家长，处理一个个琐碎的表格。晚上回到空荡荡的家里，巨大的悲伤和自责像潮水般涌上来。她觉得自己是个“狠心”的人，更是个“不称职”的朋友。她一遍遍问自己：为什么没能回去？她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位朋友。这件事像一根刺，让她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，责任与道义，似乎难以两全。

后来，她母亲生病了。她每天上下班往返路程超过一百里，通勤时间长达四小时。疲惫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她递上了辞职信。走出校门那天，校园里的桂花开了，满院子都是甜的。她回头看了一眼，转身离开。没有不舍——因为她知道，这不是终点，而是一次新的出发：为了不再错过任何重要之人、重要之事。她要把人生的方向盘，重新握回自己手里。

电商与代码：直播带货夜，撞开AI那扇门

从大学副院长到直播卖热干面，这落差，足够普通人消化好几年。但她来不及消化，因为一眼生活，二要证明自己——不信命就得拼命！

最开始的电商日子，是灰头土脸的。为了把热干面卖出去，她天天加班做市场调研，研究用户画像做到深夜。更磨人的是直播。她站在手机镜头前，扯着嗓子喊“家人们”“冲啊”，把一瓶小小的芝麻酱讲出花来。嗓子哑了，喝水继续；没人看了，对着空气也要演完。

那个改变一切的转折点，发生在一个极其疲惫的深夜。那天她刚下播，嗓子冒烟，还要赶着做第二天宣传图的文案。传统的做法是请设计师，沟通需求、等初稿、反复修改，一来一回少说要两三天。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打开了一个刚听说不久的AI绘图工具，磕磕绊绊地输入了一行提示词：“一碗热气腾腾的武汉热干面，芝麻酱金黄诱人，清晨的阳光洒在桌面上，中国风，写实。”

几秒钟后，一张图片生成了。她愣住了。画面比很多初级设计师做得要好，光影、质感、氛围，全都有了。她又试着输入一段文案，AI唰唰地出了

好几个版本，有的走心，有的幽默，质量远超她的预期。她激动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走了好几圈。那一刻，她脑子里那扇关于“未来”的门被轰然撞开。她立刻叫醒团队里的三个年轻人，兴奋地告诉他们：“别做传统电商了，这个东西能颠覆一切！我们一周内就要转型！”

又一次“不服周”的跨界选择，露出了曙光。

四个人的“百万大片”：《画皮》与一千元之梦

说干就干。转型的第一仗，她选了一个“不可能”的题目——《画皮》。

这个改编自《聊斋志异》的经典故事，要拍出“鬼气森森”又“凄美绝伦”的感觉，如果用传统影视方法，布景、特效、服化道，没有上百万预算根本下不来。

他们只有四个人、四台电脑和一颗“不服周”的心。没有一个人是电影科班出身，不懂分镜、不懂剪辑、不懂AI工作流？学！熬！拼！

杨涵涵带着他们开启了“疯拼”模式：白天查资料，看国外的AI视频教程，翻译过来一遍遍学；晚上拉片，把《画皮》电影版拆解成一个镜头，分析光影和构图，然后试图用提示词“翻译”给AI听。

失败是家常便饭。想要一个“女鬼在薄雾中回眸”的镜头，AI可能会生成一个“发了福的男明星在吃面条”。想要“烛火摇曳下凄美的侧脸”，AI可能会给你一张“五官扭曲的抽象画”。他们一遍遍调整提示词的措辞，给AI加上“8K分辨率”“电影级灯光”“辛酸的眼神”等限定词，反复试错。

那几天几夜里，办公室的灯就没熄过。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，醒了继续“抽卡”——从上百张甚至上千张AI生成的废片中，筛选出最接近想象的那一张。最终，他们花了一周时间，制作出了一部画面精美、氛围感十足的AI古风玄幻短片，全部成本加起来，仅一千多元。

这部《画皮》发到网上后，专业影视人都震惊了。他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，而杨涵涵看到了一条新赛道。随后，他们又做了纪念工人运动的《钉魂》，更加坚定了AI短剧可以有大大未来的信念。

为什么是霍去病？一个外行的选题哲学

题材库里摆着《花木兰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甚至更热门的《三国》IP，为什么偏偏选了《霍去病》？

这背后，是杨涵涵一套独特的选题逻辑。她分析得头头是道：“花木兰的故事很伟大，但已经被拍过太多次了，观众容易审美疲劳。而霍去病——少年将军，十七岁封冠军侯，二十一岁封狼居胥，说出‘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’。这种极具张力却相对较少被深度挖掘的民族英雄故事，在年轻人里有巨大的认知空白和吸引力。更何况当今的时代需要强起来的少年英雄！”

更深层的原因，是她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情结。她自己是那个一次次打破边界、向命运“开战”的“女战士”，她太懂得霍去病那种“不依靠任何人，凭着一腔孤勇和超凡才华去建功立业”的渴望了。用最前沿的AI技术去复活两千年前最闪耀的少年战神——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，本身就充满了哲学的浪漫与悲壮。

“我想用AI让更多年轻人记住这位民族英雄，用新技术讲好中国故事。”我不会忘记第一次采访她时她对我说的这句话，更忘不了说这话时她眼睛里闪耀的光。

四天四夜，一个完美镜头

《霍去病》的制作，是把“不服周”三个字刻进骨血的过程。核心团队就四个人，挤在那间堆满面包和饮料瓶的办公室里。时间紧，预算少，AI的“抽卡”属性像个调皮的孩子，总在最关键的时刻掉链子。

有一个小故事，是杨涵涵在她的电脑前讲给我听的。他们需要做一个镜头：决战前，霍去病策马立于山丘之上，回望身后万千将士。眼神里要有必胜的信念，但也需有一丝对生死无常的悲悯——风吹战袍，身后旌旗猎猎。

就这一个镜头，他们跟AI杠上了。

第一天下午，生成的第一批图：霍去病变成了“独眼龙”，头盔歪了，身后的旗子长在了马肚子上。

第二天，修改提示词，加入“写实肖像”“对称构图”。新生成的图：少年将军终于五官端正了，但眼神呆滞，身后的军队像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乐高玩具。

第三天，他们开始“微雕”。杨涵涵把自己关在会议室里，对着《史记》里描写人物神情的句子，以及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直抵人心的对白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拆解，把那些抽象的文学描述转化成AI能理解的“情绪标签”：“眼神如鹰隼般锐利，但嘴角有不易察觉的疲惫”“逆光，铠甲边缘有金边，身后千军万马虚化”。

第三天深夜，所有人都快放弃了。电脑因为连续高强度运算发出嗡嗡的声音，像在抗议。咖啡喝了几十杯，垃圾桶里全是速溶咖啡的包装袋。负责技术的男生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说：“涵姐，要不换个场景吧，这个可能真不行。”

杨涵涵没说话。她站起来，在办公室里走了三圈，然后走到那把从小陪伴她、从广州带到重庆又带到武汉的小提琴前，拉了一段帕格尼尼。琴声响起的瞬间，整个屋子都安静了。拉完，她转身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继续。”

第四天凌晨四点，第317次尝试。当画面缓缓渲染完成时，负责生成的男生忽然大叫了一声，把旁边打盹的几个人全吓醒了。

屏幕上，黎明的微光里，少年将军勒马回眸。他的眼神里有鹰的锐利，也有对身后万千追随者的悲悯与担当。风吹起他残破的披风，万千旌旗在他身后猎猎作响，虚化出一片赤色的海洋。

那个眼神，那阵风，活了。办公室里没人说话。过了好几秒，一个女生忽然趴在桌子上哭了。那是崩溃的哭，也是喜极而泣。杨涵涵走过去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，什么也没说。她自己没哭，只是眼眶红了。

这个镜头，后来成了《霍去病》刷爆全网的那个瞬间。无数网友留言：“看到霍去病回眸的那一眼，我懂了什么叫少年英雄。”

尾声：AI生成不了那道光

从产业园出来，已经快晚上八点半了。我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采访杨涵涵。此刻，武汉的夜风里带着春天特有的湿润气息。那个在二楼办公室里啃面包的女人，正带着她二十来人的核心团队，像接雪花一样，一片一片地承接这个时代漫天飞舞的可能性。

我想，AI可以生成千军万马，可以生成菜市场的讨价还价，可以生成任何你想象得到的画面。但它生成不了这个——生成不了一个三岁开始拉琴的女孩，三十多年后坐在AI导演的椅子上，什么也没说。她身后的那道光。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光。那是“不服周”的光。那是相信“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而全面发展”的光。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都住着这样一个“不服周”的自己。区别只在于：你愿不愿意，也让它亮起来？